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总策划 张余胜

絲

绸之路

的

起源



丛书主编 余太山  
石云涛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总策划 张余胜  
兰州大学出版社



# 丝绸之路的起源

丛书主编 余太山  
石云涛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丝绸之路的起源 / 石云涛著. -- 兰州 :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4.12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 余太山主编)

ISBN 978-7-311-04662-0

I. ①丝… II. ①石… III. ①丝绸之路—研究 IV.  
①K928. 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9681号

策划编辑 施援平

责任编辑 张雪宁 施援平

装帧设计 张友乾

---

书 名 丝绸之路的起源

主 编 余太山

作 者 石云涛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mailto:press@lzu.edu.cn)

网上销售 <http://lzup.taobao.com>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00 mm×1000 mm 1/16

印 张 31(插页2)

字 数 416千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662-0

定 价 94.00元

---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任

陈高华

---

### 委员（按拼音顺序）

定宜庄 韩昇华 涛 蓝琪  
李锦绣 李勤璞 厉声 林梅村  
林悟殊 刘欣如 刘迎胜 卢向前  
罗丰 马小鹤 梅维恒 牛汝极  
潘志平 荣新江 芮传明 沈卫荣  
汪受宽 王邦维 王冀青 王颋  
王希隆 王欣 魏存成 徐文堪  
杨军 于志勇 郑炳林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任

张余胜

副主任

管钰年 李玉政 汪晓军 袁爱华

赵 莉 文斌虎 马永强

委员(按拼音顺序)

崔 明 郝春喜 柯肃成 雷鸿昌

雷永林 李连斌 李兴民 梁 辉

刘 伟 卢旺存 罗和平 饶 慧

施援平 孙 伟 王世英 王永强

夏 玲 邢 珂 张东林

## 出版说明

随着 20 世纪以来联系地、整体地看待世界和事物的系统科学理念的深入人心，人文社会学科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熔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中、东欧历史文化研究于一炉的内陆欧亚学于是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内陆欧亚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人类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当下，日益高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呼声，既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也强调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我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之一，加之 20 世纪末欧亚大陆桥再度开通，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是责无旁贷；而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亦使得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和迫切。因此，将针对古代活动于内陆欧亚这一广泛区域的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的读者，不仅是实现当今该地区各国共赢的历史基础，也是这一地区各族人民共同进步与发展的需求。

甘肃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

成部分，历史上曾经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锋面，是多民族历史文化交融的历史舞台，世界几大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此交汇、碰撞，域内多民族文化在此融合。同时，甘肃也是现代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内陆欧亚商贸流通、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基于上述考虑，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将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确定为2009—2012年重点出版项目，依此展开甘版图书的品牌建设，确实是既有眼光，亦有气魄的。

丛书主编余太山先生出于对自己耕耘了大半辈子的学科的热爱与执著，联络、组织这个领域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呈现给了各位读者，其兢兢业业、如临如履的工作态度，令人感动。谨在此表示我们的谢意。

出版《欧亚历史文化文库》这样一套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立足学术与教育出版的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本着重点图书重点做的原则，严格于每一个环节和过程，力争不负作者、对得起读者。

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学术出版在这个领域里与学界的发展相偕相伴，这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不懈追求。当然，我们最根本的目的，是向读者提交一份出色的答卷。

我们期待着读者的回声。

# 总序

---

本文库所称“欧亚”(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以及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的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文化上的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做一个整

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

中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其历史进程从一开始就和内陆欧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只要注意到历代王朝的创建者中有一半以上有内陆欧亚渊源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可以说，今后中国史研究要有大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内陆欧亚史研究的进展。

古代内陆欧亚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古代中国与位于它东北、西北和北方，乃至西北次大陆的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无疑是古代中外关系史最主要的篇章，而只有通过研究内陆欧亚史，才能真正把握之。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既饶有学术趣味，也是加深睦邻关系，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因而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由此可见，我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生责无旁贷。

为了联合全国内陆欧亚学的研究力量，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内陆欧亚学这一新学科，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适应打造学术精品的战略要求，在深思熟虑和广泛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本文库所收大别为三类：一，研究专著；二，译著；三，知识性丛书。其中，研究专著旨在收辑有关诸课题的各种研究成果；译著旨在介绍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研究专著；知识性丛书收辑有关的通俗读物。不言而喻，这三类著作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构建和发展中国的内陆欧亚学，任重道远。衷心希望全国各族学者共同努力，一起推进内陆欧亚研究的发展。愿本文库有蓬勃的生命力，拥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

最后，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支持这一文库编辑出版，确实需要眼光和魄力，特此致敬、致谢。



2010年6月30日

# 前　言

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 (Richthofen Ferdinand von) 曾于 1860 年随德国经济代表团访问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1868 年 9 月又到中国进行地质和地理考察, 直至 1872 年 5 月。在将近 4 年时间里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到过 14 个省区。回国之后从 1877 年开始到 1912 年, 他又用了 5 年时间写出并先后发表了 5 卷本《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China) 的巨著, 并附地图集两卷。这是他 4 年考察和多年研究的结晶, 对当时及以后的地学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这本巨著第 1 卷中, 他首次提出“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n) 这一概念, 而且根据他的论述, 这条路线还有东段和西段之分。所谓东段自中国渭水流域至阿富汗, 而西段则指马利诺斯 (Marinus) 所说的从欧洲东来的道路。<sup>[1]</sup> 此说提出后得到一些欧洲汉学家的支持和阐发。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 西方以及日本的“探险家”和“旅行者”如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和橘瑞

[1] 李希霍芬说: “我们发现, 绝大多数的旅人在穿过沙州、罗布泊边的楼兰和于阗 (Khotan) 之后, 较少会选择通过帕米尔山口的道路。与之相反, 穿过特勒克达坂 (Terek-dawan)、经拔汗那 (Ferghana) 到达大宛这条路上的交通却非常活跃。在公元 1 至 5 年时, 一条由沙州向西北去的新路被开辟了出来, 不过这条路似乎并未作为通往锡尔河 (Yaxartes) 的交通路线而长久存在。那么现在, 我们也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南部这条路的交通状况上来。这一时期, 这条路东端通常被提到的两个出发点是玉门关和阳关。对于前者, 我们有着比较详细的了解, 它就是后来的嘉峪关, 位于肃州以西 200 里之处, 是长城最重要的门户。对于后者人们并不确知它所处的位置, 但毋庸置疑的是, 它位于沙州以西约 170 里的地方。从这里出发, 上述的早期交通干道经过于阗, 或许到达了一处是阿姆河、另一处是锡尔河所在的地方。而从玉门关出发的交通道路则是到达了吐鲁番 (Turfan)。还有其他的一些穿过塔里木盆地的道路, 此处将不再考察。关于早期丝绸之路 (Seidenstrasse) 西段的更多消息, 我们可以从马利诺斯 (Marinus) 那里获得。他所依据的是马其顿人马埃斯 (Maës) 的代理人的报告。托勒密 (Ptolemaeus) 对这份可能是相当详尽的原始报告做了一个简短的评论, 现在我们只能从他的评论中得知这份报告的相关情况。”见氏著:《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第 1 卷, 柏林, 1877 年, 第 495—496 页。

超、美国的亨廷顿等,陆续到中国西北边疆地区进行考察,发现古代中国与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国交往的许多遗址和遗物,证实和说明了这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商道的存在和发展。

1910年,德国东方学家阿尔巴特·赫尔曼把这条贸易路扩展到更远的叙利亚,他著有《中国与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他说:“我们应把这个名称——丝绸之路的含义进一步一直延长通向遥远的西方叙利亚。虽然在与东方古老的大帝国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叙利亚始终没有与它发生过什么直接关系,叙利亚不是中国生丝的最大市场,但却是较大的市场之一。叙利亚主要是依靠内陆亚洲和伊朗的这条道路获得生丝的。”<sup>[1]</sup>这些观点符合历史的实际,因此得到欧洲东方学家的支持和肯定,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许多中亚的探险家不断使用丝绸之路或丝绸贸易之路的名称<sup>[2]</sup>。法国东方学家R.格鲁塞在他的名著《从希腊到中国》一书中有所阐述,并盛赞古代丝绸之路在中西文化交流和古代文明史上的巨大贡献。20世纪30年代中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出版了以“丝绸之路”作为书名的杰作,生动记述了1927年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西域考查和探险的历程,书中专辟一章介绍“丝绸之路”。在他后来的著作《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一书中,也有一章“沿丝绸之路前进”<sup>[3]</sup>,更使丝绸之路“有了立体感,并普遍为学术界、读书界所接受”<sup>[4]</sup>。此后“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就为人们普遍认可,并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

通常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指这条贯通欧亚大陆的古代交通道路,东起渭水流域,具体地说就是作为古都的长安,并且向中国内地延伸。有时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都城的迁移,其东端也改变为其他

[1] [德]A. Hermann.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Berlin, 1910. p. 10.

[2] [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研究之展望》,氏著《丝绸之路史研究》(代序),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3] [瑞典]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徐十周等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27页。

[4] 杨镰:《丝绸之路的经行者与探索者》(代序),[瑞典]斯文·赫定:《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地方,比如东汉时的洛阳。从渭水流域向西,出陇西高原,经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地区,便进入西域。汉朝设立河西四郡,敦煌为四郡最西端的城市,成为通向西域的咽喉。由此入西域有两条路线,出玉门关为北道,出阳关为南道。北道自玉门关西出,过白龙堆(罗布险滩)至楼兰,沿今新疆境内塔里木河北面的通道,沿天山南麓西行,经车师前王庭、焉耆、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市),在此通过捐毒(今乌恰西北)越帕米尔高原,经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和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南部西行。南道经今新疆境内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通道,经楼兰(后改名鄯善)、且末(今且末南)、于阗、皮山(今皮山南),在莎车(今莎车县)以西经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出明铁盖山口,越葱岭,沿兴都库什山北麓喷赤河上游西行。两条路线会于木鹿城(今土库曼斯坦马雷),再向西经和椟城(今里海东南,伊朗达姆甘附近)、阿蛮(今伊朗哈马丹)、斯宾(今伊拉克巴格达东南)等地,抵达今叙利亚地中海东岸。而后西南行至今埃及,那里古代有亚历山大里亚,地属大秦(罗马),成为此线终点。从叙利亚西北行,至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便可继续西行至罗马,成为此线终点,从叙利亚至罗马还有地中海水路可通。这条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从中国西北地区西行,因此称为西北丝绸之路;因为在中国新疆地区、中亚和西亚都有浩瀚的沙漠,因此又被称为沙漠丝绸之路。沙漠上有许多绿洲,成为行旅的中转站,连接起中西间的交通路线,因此又被称为“绿洲之路”。

南北两道在葱岭东西都有不少支线互相交通,如于阗虽为南道当道之国,而“南与若羌接,北与姑墨接”,姑墨为北道之国。皮山“西南至乌秅国千三百四十里,南与天笃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南当罽宾、乌弋山离道,西北通莎车三百八十里”<sup>[1]</sup>。大宛“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接”<sup>[2]</sup>。而自康居西北通奄蔡,向南可至大月氏,西南则通安息。

[1]《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881 - 3882 页。

[2]《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第 3894 页。

除了上述南北两道之外，在新疆境内还有两条经常为人所利用的交通干线，一条出玉门关后向西南行至伊循，南行至若羌、小宛、戎卢、渠勒至疏勒。另一条则从敦煌向北到伊吾，北越天山，至蒲类，由此西向沿博格多山北麓到车师后王国（今吉木萨尔），经卑陆（今阜康市东）、单桓、乌贪訾离，西出特克斯河至乌孙。从新疆往中亚以及更远地区的国际通道，南道又有一线从皮山西南经乌秅、悬度（特鲁以东）至罽宾（查萨达），出开伯尔隘口后经过喀布尔，西南到达乌弋山离（亚历山大—普洛夫达西亚）。据《汉书·西域传》，南道至此而极。继续前行则经伊朗南道可以转北而东到安息国都。北道亦有一线，由温宿西北越过别迭里隘口（勃达岭）到赤谷城，经都赖水（塔拉斯河）通康居，由康居所在的河中地区（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地带）南下，又可至大月氏和安息。这些国际通道通过中亚延伸至西亚、地中海东部利凡特工商城市和欧洲，甚至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也发生了贸易联系。

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指的是从古代长安出发、通向中亚，由中亚辐射欧亚大陆、北非各地的道路。大致的经行路线和走向如此，历史上不同时期都会有若干变化。丝绸之路不是一条线直通东西，而是一个交通网络，绵亘数千里，纵横交错，联结旧大陆各文明地区各个国家和民族，<sup>[1]</sup>成为中西交通的大动脉。它不仅是贸易路，也是文化交流、文明对话之路，对促进古代世界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巨大的作用。随着对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深入，有的学者把丝绸之路的名称沿用到东西交通的欧亚草原之路和经由中国南海、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而至欧洲的海道，以及从中国四川、云南出发，经缅甸至印度的道路，分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

[1] 在一般人的观念里，丝绸之路就是贯通欧亚的一条路，如斯文·赫定说：“丝绸之路全程，从西安经安西、喀什噶尔、撒马尔罕和塞琉西亚，直至推罗，直线距离是4200英里。如果加上沿途绕弯的地方，总共约有6000英里，相当于赤道的四分之一。”见氏著：《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

可能是最早连接东西方的道路。<sup>[1]</sup> 欧亚大草原是世界上最大的草原，东起中国北方，西至欧洲多瑙河流域，自古便是游牧人的天堂。古代游牧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最早沟通了中西间的联系，中国丝绸最早西传可能就是经草原民族之手实现的。从“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记载的欧亚草原民族的活动，可以知道至迟在公元前 6 世纪，欧亚草原之路已经走通。在李希霍芬的《中国地图集》中已经涉及“海上丝绸之路”<sup>[2]</sup>。法国汉学家沙畹（1865—1918 年）在《西突厥史料》一书中提出：“丝路有海陆两道。”1967 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出版《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一书，第一次明确使用了这一概念。<sup>[3]</sup> 香港学者饶宗颐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探讨，20 世纪 70 年代，他在广州南越王墓看到波斯银器，跟他在法国看到的一模一样，也肯定了中西方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北京大学陈炎教授多年从事海上丝路的研究，出版有《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论文集，<sup>[4]</sup> 则将海上丝路进一步扩大，凡经过海上交通与海外各国进行交往交流的路线皆可称为海上丝路。近年来又有人把从四川、云南出发经由缅甸至印度的路线称为“西南丝路”或“南方丝绸之路”。把经由西藏至印度的道路称为“中印藏道”或“吐蕃－尼婆罗道”。无论海路还是陆路，中外交通路线都有一些主线和支线，在这些形成网络的交通干线上，都有中国丝绸外运的记载和遗迹。因此把中外交通的道路称为“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共识。

中西交通的陆路和海路是以向外传播中国的丝绸而闻名于世的，

[1] 最早提出经过北亚的草原路这两个概念，可能是 Enoki, K. and Matsuda, H. etc. *Research in Japan in Histor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tacts*. Tokyo. 1957，参前揭长泽和俊：《丝绸之路研究之展望》，第 9 页。

[2] 据斯文·赫定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也是李希霍芬提出来的，他说：“‘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不是在中国文献中首先使用的。这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名称，最早可能是由男爵李希霍芬教授提出的。他在一部关于中国的名著中使用了‘丝绸之路’——SILK ROAD——这个名词，并进行了论证；在一张地图上还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见氏著《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2 页。

[3] [日]三杉隆敏：《探索海上丝绸之路》，创文社，昭和四十二年（1967）。

[4]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在经销的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和影响之深远方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产品能与中国的丝绸相比肩,因而称为丝绸之路确是十分恰当。有人指责丝绸之路一词用得过于宽泛,以为有的路线上并无丝绸输出,所谓“一丝不挂”,也称丝绸之路。这是对中国古代丝绸输出的历史不甚了然的表现。实际上根据我们的考察,古代中外交通的每一条商业路线,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能说明丝绸是维系其持续发展的重要纽带。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丝绸贸易的范围。文化交流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丝绸之路把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美洲印加文明以及各世界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印度、中国等都联结在一起,形成了沟通世界各地的交通网络,使世界上的这些古老文明通过这个交通网络互相传播而放出了异彩,给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推动了世界各地人民的互相了解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因此,丝绸之路从狭义上讲是物质交换和经济贸易之路;而从广义上讲,则是文化交流之路和文明对话之路。季羡林先生说:“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sup>[1]</sup>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则为古代世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近年来,关于丝绸之路出现了起点之争。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争论不大,成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基本上为大家所接受。“古代南方丝绸之路 0 公里”地标碑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揭碑,标志着“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起点最终确定在了成都附近的广汉。争论最激烈的可能是关于洛阳与西安哪个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河南南阳、安阳,山东青州都曾经想夺得“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的桂冠。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东西方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但何处为始发港也存在不同认识,福建泉州,浙江宁波、杭州,广东广州,广西合浦,香港等港口都拿证据声

[1] 季羡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见《中外美术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称,自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始发港。这样的争论在学术上本来没有太多意义,但也引起我们产生某些有意义的思考。丝绸之路的起点有空间上从哪里出发和时间上从什么时候开始之分,我们称之为起点和历史起点。空间起点随着时代变迁会有转移,历史起点则只能有一个,任何事情只能有一个开始。当有人提出丝路起点只能有一个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历史起点,正像一个人不可能有多个出生时间。但丝绸之路历史起点从何时说起呢?这像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说简单,因为你如果问道:“丝绸之路从何时开始呢?”许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张骞出使西域。可是实际上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首先,丝绸之路有沙漠绿洲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张骞所代表的只是沙漠绿洲之路。丝绸之路各条主线都有自己的历史起点,张骞出使西域不能说明其他路线的起点问题。其次,就沙漠绿洲路来说,它的产生和形成也难用某一人物的活动或某一事件的发生说清楚。在张骞之前,中国与西域或更远的地方早就发生文化上的联系,有大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说明,存在沟通相互间联系的人类活动。再次,就张骞的时代而言,实现中西间的交通有多种因素,张骞的活动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汉朝对匈奴军事上的胜利,汉朝与西域的联系仍然为匈奴所阻隔;如果没有后来汉朝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逐利而往的商业贸易活动,也无法造成日益深入的经济文化交流;如果没有汉代发达的丝织业,没有精美的丝绸和优秀的文明吸引异域国家和民族的向往,也很难形成“商胡贩客,日奔塞下”的局面,如果没有……这样的促成因素太多了,总之,把中外交通的开展和文明互动的启动归功于一个人的活动,无法说明复杂的历史问题。

而且,把丝绸之路的开辟归于张骞出使西域,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不正确。即便是从中国丝绸和丝织技术的输出这一极其狭义的角度考察,也是如此。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蚕桑丝织技术最早是传向我们的东邻朝鲜半岛,始于箕子入朝鲜,《汉书·地理志》“燕地”条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仪田蚕织作。”中国丝绸传至遥远的欧洲,最早是经过欧亚草原之路,大约在公元前五六世纪,相当

于中国春秋时期。印度古代文献记载反映,印度获得中国丝绸则大致相当于中国战国时期,最有可能是经过南方丝绸之路。据《汉书·地理志》“粤地”条记载,汉武帝平南越之后,汉使出海至印度和斯里兰卡,携带的是“黄金、杂缯”,交换对方的明珠、碧琉璃。而考古资料说明,可能相当于商代时丝绸已经通过海路传至埃及。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汉朝早与匈奴建立和亲关系,那是汉高祖刘邦创立的处理与匈奴外交关系的策略。汉地丝绸已经随着和亲的队伍输入北方草原。相信北方草原民族获得中原地区的丝绸要比这个时间早得多。张骞出使西域在汉武帝时代,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这时“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说明丝绸通过丝绸之路绿洲路西传确是张骞通西域之后。在这条最著名的丝绸之路沙漠路上,丝绸的输出却是最晚的,蚕桑丝织技术传入西域更是晚到大约东汉魏晋,传到波斯和罗马则是大约公元五六世纪的事情。

历史研究有一个“源头崇拜”,无论研究什么问题,历史学家总想探讨或揭示最早期的状况。然而,越往前追溯就越渺茫,就越难以说清。也正因为如此,历史研究才更具有吸引人的魅力,它考验着人们的认知和研究能力。丝绸之路历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其发生史包括交通的创辟和交流的发生两个方面。无论是交通和交流,都是从无到有,从近到远,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地、间接地、自发地到直接地、有规模地和自觉地进行交往和交流。从整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来看,这个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生和发展充满不少谜一样的问题等待破解,有的问题可能永远成为人类之谜而供猜测。文化具有扩散的功能,文化一产生就会扩散,但立足于今日中国版图而言的中外交流,即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扩散能够影响到对方文化的发展,发生在何时?是怎样发生的?实际的情况有时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根据我们的考查,远在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可能已经存在中国与域外的文化接触。中国西南地区和印度、东南亚的砍砸器有相似的特征,云南富源大河镇出土具有莫斯特文化特征的石器。如果说那里的信息还不够确切,距今1万年左右至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包